

构筑新常态背景下增长动力的新机制

沈坤荣

(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 210008)

摘要: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增长驱动力、劳动力禀赋、产业结构、技术选择、资源环境等方面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需要构筑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以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以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创新驱动;产业结构;收入分配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15)02-0001-04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以年均 9.9% 的速度高速增长。然而自 2010 年中国 GDP 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与表现。2010—2014 年中国经济增速连续下滑,2012—2014 年 GDP 增速连续 3 年低于 8%,2014 年经济增长速度仅为 7.4%。但是 2013 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成为 1952 年有 GDP 历史数据以来的最大值。这种 7% 左右的增速和经济结构的转型组合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了较长期的不同于以往的状态,即以中高速增长、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经济“新常态”。

当前,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全球经济疲软背景下开启的结构性改革正全面启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也正步入深化期,结构性深度改革的全球性竞争在大调整与大过渡阶段全方位展开,这要求我们应该以新的标准和角度来看待经济问题。在全球结构性改革深化的背景下,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面对经济新常态,如何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二、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新变化

1. 经济增长驱动力的变化

迈克尔·波特根据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量将国

家经济发展划分为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创新导向、富裕导向 4 个阶段^[1]。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及相互作用的有效性与一国的经济增长是密不可分的。在一国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需要依赖基本生产要素如天然资源、自然环境、廉价劳动力等方面的投入来发挥国家竞争优势。中国过去 30 多年间的经济增长依赖的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推动,属于投资和劳动力资源带动的要素驱动阶段。大量理论与经验研究表明,在 1978—2010 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要素驱动,要素投入量对经济发展做出了主要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则相对较低^[2-3]。刘瑞翔利用 1989—2010 年中国的省际数据从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消耗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研究发现资本和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高达 70.2%^[2]。在改革开放之初,生产要素的边际报酬相对较高,我们依靠资本、劳动等要素的增加驱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资源禀赋、经济结构也在随之不断发生变化,高投入、高增长、低消费、低就业质量的发展方式出现了许多问题,曾经以外延式、粗放型、总量扩张为主要特征的要素驱动型发展方式在面临日趋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挑战的同时,也受到国内资源环境、劳动力资源等要素不可持续供给的约束。要适应国际经济环境的新变化、克服国内资源环境的强约束,必须关注技术创新对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推动作用,从

收稿日期:2015-03-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A023)

作者简介:沈坤荣(1963—),男,江苏吴江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经济增长、宏观经济研究。

要素导向、投资导向步入创新导向阶段。

2. 劳动力禀赋优势的变化

中国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多。长期以来,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蔡昉认为当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上升、人口年龄结构处于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以及高储蓄率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的源泉,即存在人口红利^[4]。但是,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大大快于其他国家,随着生育率的不断下降,人口增长率将会趋于降低,人口就会出现老龄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总人口已达到13.4亿,与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相伴的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不断地提高,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了8.87%。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当人口老龄化使得其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性的时候,人口红利便会丧失,原有劳动力要素的比较优势也将消失。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保障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也就需要进行相应的转变。

3. 产业结构的变化

经济新常态下生产结构调整的主要表现就是农业和制造业的比重显著下降,服务业的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制造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013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为56957亿元,比上年增长4.0%;第二产业增加值为249684亿元,比上年增长7.8%;第三产业增加值达262204亿元,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12520亿元,比上年增长8.3%。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分别为10.0%、43.9%和46.1%,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但从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作用来看,第一、二、三产业的贡献率分别为4.9%、48.3%和46.8%,GDP增长速度与各产业贡献率的乘积分别为0.4%、3.7%、3.6%。从要素转移视角来看,现有研究表明,对于发展中国家,各部门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和增长率,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水平或低增长率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水平或高增长率部门的流动会促进总生产率增长^[5-6]。长期以来,中国的劳动力要素一直从第一产业流向第二、三产业,对生产率的增长发挥了较强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第二产业内部的生产率贡献相对较大。但是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弱于劳动的流动性,资本要素转移的贡献则与劳动力相比存在较大差异,资本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对生产率的提高只发挥了微弱的效应。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要素转移对于增长的效应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4. 产业结构升级中技术选择的变化

产业结构的转化体现了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与有效性,可以有效改变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从技术进步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往往倾向于通过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或本国技术自主研发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的增长。黄茂兴等以1991—200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基础,围绕省域效应和时间效应两个方面分别检验了技术选择对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发现选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利用先进技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主要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7]。只有结合要素禀赋结构并在能够吸纳新技术的前提下,技术选择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随着经济不断增长,重工业水平不断提高,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后,对新技术的吸收和创新能力将持续增强,产业结构将会得到优化升级,在此基础上,技术选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显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资本要素非常有限,而发达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的“再工业化”战略一方面可以通过降低税负来提高制造业吸引投资的能力,促进制造业的回归、重整和提升;另一方面则可以利用知识产权保护协议以及高技术出口管制等方略来构筑坚固的技术壁垒,这就会使得我国吸引外资和引进高技术的难度明显加大。随着制造业回归本土,发达国家就可以采用先进技术对制造业进行全新的改造,重获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从而大大降低制造业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我国以前较长时期内依靠劳动力成本所获得的比较优势将会不断丧失。因此,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过程中技术选择、主导产业选择等方面的内容也需要相应随之发生变化。

5. 资源环境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物质要素的投入来推动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大量的资源投入和环境污染为代价。1978—2013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57144万t标准煤迅速上升到375000万t标准煤。工业生产活动不仅大量消耗了自然资源,而且也严重污染和破坏了环境。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人们宁可承受较大的环境污染去换取工业的发展,但是随着工业发展到较高阶段,环境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8]。环境容量是有限的,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迅速推进,其对生态系统也带来巨大的负担。由于多数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本身较少,以往粗放型、掠夺式的发展方式又持续削弱了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再加上经济的大规模扩张、消费需求的增长、生产和消费结构变化对资源消耗的

需求大大提高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我国资源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发展难以为继。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关注资源利用效率和低碳经济,加快对高耗能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改造,从而促进资源环境的合理开发与节约使用。

三、新常态下增长动力机制的构建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以及前期政策刺激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能否适应经济新常态将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是否能够相应发生转变。

1. 以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经济发展从要素导向、投资导向进入到创新驱动阶段,将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生态环境的改善等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来说,创新驱动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①创新驱动可以大大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经济系统中各相关生产要素间充满着深层次的技术关联。创新驱动能够促进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促成生产要素的有机组合,从而高效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优化。②创新驱动能够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显著提高。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两大增长路径分别为:规模报酬不变基础上的规模扩张路径和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的效率提升路径。在发展的初始阶段,资源环境约束相对较弱,这时可通过对创新依赖不强的规模扩张路径来实现经济的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当水平达到比较高的阶段时,资源环境的约束就会不断地得到强化,规模扩张路径下的发展方式便不可持续,需及时推动经济增长路径的恰当转换。创新驱动能够大大优化要素的配置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推动经济发展向效率提升的阶段转变。③创新驱动能够促进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经济发展除必要的经济成本外,不可避免地还包含着环境成本。以往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依靠的主要是生产要素数量的扩张,这就就会造成对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和过度利用,并以对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与破坏为发展的沉重代价。创新驱动能够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显著降低生产投入与消耗、淘汰高污染产能、大大降低污染排放,从而促成传统的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的经济发展方式向着现代的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有效转变。

基于此,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需要在经济发展中特别强调创新的驱动力作用,通过利用科学知识、先进技术、新型企业组织制度以及现代商业模

式等创新要素,对既有的资本、劳动力资源、物质资源等有形要素进行创新的组合,通过改造物质资本、提升科学管理水平和劳动者素质,在合理配置物质资源投入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创新驱动的实质体现的是科技创新,利用成熟可靠的科技创新成果来改造旧产业并且催生新产业^[9],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的动力。与此同时,科技创新又不断地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来激励,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是科技创新能够顺利实现的重要保障。

2. 以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经济增长的实现路径

制造业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科技进步以及国际竞争力增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目前,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大量低水平生产能力将出现过剩,制造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国际市场需求下滑对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业造成较大的结构性制约;另一方面,为了缓解失业、扩大内需、拉动本国经济增长,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选择了“再工业化战略”,制造业开始向本土回流,与此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依靠资源、劳动力等比较优势正大力发展制造业,与我国形成了日趋激烈的同质竞争。因此,大力提升制造业的质量与效益就成为经济新常态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的制造业与发达国家在产品质量、稳定性以及可靠性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距,在中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优化升级过程中,将面临技术装备的新一轮更新改造,高端制造业的成长成为抢占新一轮国际竞争制高点的关键。为此,我们需要大力发展能够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的高端制造业。

此外,制造业与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互促共进。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制造业的发展需要消耗大量的生产要素、拉动许多产业的发展,其发展对带动服务业增长具有明显的作用;同时服务业(包括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也能为制造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特别是金融、保险、信息、通讯、工程技术、创意设计、研发、咨询、知识产权保护等与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高度相关的生产性现代服务业,均包含着大量的制造业升级所需知识和技能。现有产业的深化发展与新兴产业的健康成长均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基于此,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需要发展高端制造业及相应的现代服务业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 以收入分配结构优化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收入分配失衡状况也在不断加剧,从收入在生产要素之间的分配来看

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劳动者报酬比重不断下降;从收入在居民个人之间的分配来看居民收入分配向富人倾斜,城乡间、个体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增长的重要保障,它对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影响体现在:①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能够扩大消费需求。一般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低的高收入阶层通常会偏爱高档消费品,对扩大社会消费需求的效应不够明显;而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低收入阶层则购买力有限,消费需求受到极大的制约,缩小收入差距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持续增长。而且劳动要素分配份额过低会导致以劳动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受到影响,因此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也可以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10]。②收入分配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在中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生地的差别会严重影响到劳动者接受教育、通过培训获得技能的机会。不同的收入阶层会根据各自的承受能力以及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用大小来选择是否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如何来进行投资。当收入差距过大时,低收入阶层将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且当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时,劳动要素收入份额下降会将失衡状态传导至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低收入劳动者很难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渠道获得收入增长,由此居民收入分配结构与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状态进一步被强化,从而阻碍到经济增长。

2014年10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标同比名义增长11.5%,创下了自2006年3月以来的新低。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这一指标同比名义增长15.9%,更是跌到了自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且随着生育率水平的持续下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折已难以避免,以往主要依靠劳动力规模扩张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方式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人口增长减缓的严重制约,因而通过大力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来全方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也就变得至关重要。基于此,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我们在改革目标和价值判断上要强调改革成果的股份性,在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中都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在收入普遍提高的基础上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波特. 国际竞争优势[M]. 李明轩, 邱如美,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2.
 [2] 刘瑞翔. 探寻中国经济增长源泉: 要素投入、生产率与环

境消耗[J]. 世界经济, 2013(10): 123-141.

[3] 邓翔, 李建平. 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J]. 管理世界, 2004(11): 68-76.
 [4] 蔡昉.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 经济研究, 2010(4): 4-13.
 [5] PPENEDER M. Structural change and aggregate growth [R]. WIFO Working Paper, Vienna: Austr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2002.
 [6] 干春晖, 郑若谷.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进与生产率增长研究: 对中国1978~2007年“结构红利假说”的检验[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2): 55-65.
 [7] 黄茂兴, 李军军. 技术选择、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09(7): 143-151.
 [8] 金碚. 资源环境管制与工业竞争力关系的理论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 2009(3): 5-17.
 [9] 洪银兴. 关于创新驱动和创新型经济的几个重要概念[J]. 群众, 2011(8): 31-33.
 [10] 刘盾, 施祖麟, 袁伦渠. 论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巴杜里—马格林模型的实证研究[J]. 中国经济问题, 2014(2): 3-15.

